



宋词管窥

高明泉/著

[二]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宋词管窥

高明泉 / 著

[二]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词管窥/高明泉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227-02775-1

I. 宋… II. 高… III. 宋词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6845 号

宋词管窥(二)

高明泉 著

-
- 责任编辑 哈若蕙 贺秀红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 13.5
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3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2775-1
定 价 89.80 元(全三册)
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作家篇 (续)

- 苏轼词与他的思想 (1)
- 贺铸及其词 (12)
- 集大成的词人——周邦彦 (28)
- 辛弃疾词的忧患意识 (55)
- 辛弃疾词的用典手法 (70)
- 辛弃疾词的情感表达方式 (79)
- 高观国及其词 (95)

风格篇

- 柳永与李清照词比较 (114)
- 秦观词的情调 (124)

苏轼词与他的思想

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，他的思想在其一生经历的各个时期，通过他的词作得到了比较明确的体现，一般认为，苏轼的思想是杂家思想的矛盾统一，既有儒家的思想，又有佛老思想，还兼有道家思想，但是具体分析来着，可以发现苏轼在其经历的不同时期，其思想的发展变化有所不同。

作家篇

一、“至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——积极用世

苏轼的思想在早期读书和应举时期，基本上是儒家思想，主张积极进取和用世，忠君报国。早期词作不多，他的思想主要表现他的散文及策论之中。他在考取进士时所作的策论论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其中心就是阐述儒家的“仁政”治国思想。开头便说：“尧舜禹汤……之际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”。主张“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”，刑赏分明，治之以道。他早年“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”，并肯定韩愈的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之说，但又批评韩愈的“于圣人之道，盖益知好其名矣，而未能乐其实”的做法，苏轼甚至还指责理学大儒程颢、程颐“以佛老之似，乱周孔之真”。他认为西晋以谈论老庄玄学而亡，梁朝以迷信佛教而亡。他的文学论文、政治论文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一务实思想。在他著名的《日喻》一文中，通过生来就目盲的人对太阳的种种揣测和北方人学潜水的故事，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生而眇者不知

曰，有目者告之‘日之状如铜盘，扣盘而得其声，他日闻钟，以为日也。或告之如烛，扞烛而得其形，他日揣籥（yuè），以为日也’。”这说明对“道”——事物的规律，必须通过学习以取得亲身感受。诚如“凡不学而务求道，皆北方之学没者也”。正因为这样，苏轼能够关心国家命运，投身政治斗争，参与治国治世的实践，并且写下了许多反映国计民生的优秀作品，以申述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他参加制科考试时作的《进策》、《进论》各二十五篇，体现和表达了他的政见和儒家仁政思想，如《王者不治夷狄论》、《教战守策》等，主张治国平天下，必须要以仁政，而不必用武力。他的这种思想正是“远主不服，修文德以来之”的体现。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多讲礼义、道德，发挥了他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“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”的思想。他早期的词作有 1071 年的《少年游·润州作》（去年相送，余杭门外，飞雪似杨花），知杭州通判时的《南乡子·送述古》（回首乱山横，不见居人只见城）和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（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）等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词

人的政治思想。特别是赴密州任上所作的《沁园春》（孤馆灯青，野店鸡号，旅枕梦残）词以议论入词，直抒胸臆，表现了苏轼的儒家积极用世思想，“当时共客长安，似二陆切来具少年。有笔头千字，有胸中万卷；至君尧舜，此事何难。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闲处看。”由此可见，早期的苏轼充满信心与理想，有志于治国平天下，干一番大事业。

二、“人生如梦”“世路无穷”——矛盾忧虑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因激烈的党争，苏轼自请外调，先后出任杭州通判，密州、徐州知州，这是他政治上受到的第一次打击。但这时的苏轼并没把这次打击放在眼里，认为是暂时的。因为当时神宗皇帝对他很赏识，最初神宗皇帝曾御批他为知州，因革新派的反对，才改杭州通判的。他也对神宗抱很大希望，在地方官场上时常存在着东山再起的幻想。所以他到杭州以后，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。有时与老词人张先同游西湖，作词赋诗；有时饶有兴趣地观赏中秋节的钱塘江潮，惊叹弄潮儿迎风

破浪；与友人赠别唱和，书画交友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苏轼几乎忘怀了受挫折的抑郁，流露出“湖山值是东南美”的欣喜赞美。但同时，作为对理想充满希望的苏轼，并没有完全沉湎于湖光山色之中，而是仍然以治国匡世为己任，时常思念为国效力，建立功绩。于是便在杭州勤政爱民，兴修水利，为民办实事，做出了卓著的政绩。此时他的儒家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，忠君报国的思想并没减少。他在此时作的《南乡子》词，借汉代班超和马援的故事，表达他自己“帕首腰刀”，驰骋沙场的抱负。他因弟苏辙在济南，求为东州守，得请高密。在离开杭州时，写了一首《沁园春·赴密州，早行，马上寄子由》；词中虽慨叹“世路无穷”，但毕竟是一时失意的哀愁，对于自己“致君尧舜”的抱负，仍然信心十足。他把这当作是人生必经的“自然之理”与客观规律，正如他的中秋词《水调歌头》中所说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”

苏轼到了密州任太守，他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，产生了一种矛盾思想。既对理想抱有幻想，又对自己的处境开始忧虑。他在密州写的

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一词，是这种矛盾思想的表露。这时他离开京城已有四年之久。词中抒发了“会挽雕弓如满月”的爱国主义豪放情绪，但也流露了“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”的失望感慨。因为这时的苏轼毕竟已是“尘满面，鬓如霜”了，仕途的坎坷，内心的痛苦，使他已有“寂寞山城人老也”的悲愁之感。这种处境就使得他报效皇恩，建功立业的思想同岁月蹉跎、无可奈何的思想矛盾同时存在。《水调歌头》词，就是这种矛盾思想的反映和写照。《古今词话》中说：“神宗读至‘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’，乃叹曰‘苏轼终是爱君’”。刘熙载也认为这首词是有寄托的。他说：“《水调歌头》‘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’，尤觉空灵蕴藉”。他在词中把对现实中矛盾的思想，通过对苍天明月的询问而表现出来，既是对人生答案的寻求，也表现了对人生现实的疑虑。从苏轼的经历来说，长期的命运遭际，思想痛苦，使得苏轼的儒家思想逐渐消退，老庄的思想在他心中滋长。他仕官密州，密州城外有一高台，苏轼便进行修建，取名曰“超然亭”，可见他的用意。亭既成，便常常登临。他

在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一词中写道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”。虽然词中说“休思”，貌似超然，但实际上是更强烈的思想情绪的反射，在超然中，表现出他的矛盾情绪，这正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失意而致。长期的受压、排斥，使苏轼的失望之情日益强烈。他在《西江月》中说：“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来皆梦。”在徐州作的《永遇乐》（明月如霜）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词中吊古伤今，自称“天涯倦客”，感伤“人生如梦，何曾梦觉”。这都是词人政治失意、内心痛苦的哀吟。这时的苏轼正是“进亦忧，退亦忧”，处于进退两难的矛盾之中。



作家篇

三、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

——旷达超脱

苏轼政治上失意以后，出京作地方官。但他仍然勤政爱民，尽心职守。后因“乌台诗案”，被捕下狱，多亏亲友的营救和神宗的干预，苏轼才未遭杀身之祸，最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成为一名闲散之官。正是“乌台诗案”



这一飞来横祸，彻底粉碎了苏轼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幻想。“乌台诗案”发生时，他与妻子诀别，留书于弟辙，处置后事，自期必死。过扬子江欲自投江，因吏卒监守未果。在狱中，其子为他送饭，他说：“平日送食只送肉，如有不测便送鱼。”后来一位亲戚送饭时送了鱼，他大吃一惊，作了《狱中案子由》诀别诗：“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玕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”经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内心交织着忧愤、倔强、孤寂、高洁的复杂感情。当时他写下了著名的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作》，词中那只“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，拣尽寒枝不肯栖”的孤鸿，正是作者的化身。老庄思想已经很浓厚。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《前后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这几篇名作，是他报国壮志无法实现，功名事业已成为泡影的情绪的曲折含蓄表露。

他在被贬到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，苏轼的思想达到了极度的消沉，生活上也陷于极度的困顿。使他这时只有靠自己躬耕种植和同僚朋友的帮助，才得以安定生活。但是他的深沉的思想痛苦却是无人理会。因此，苏轼便把目光

投向了六百年前的陶渊明先生。他说：“吾于诗人，无所甚好，独好渊明之诗。”他常常是“手把梅花，东望忆陶潜”。他在诗词中嬉笑怒骂，直抒心怀。他在一首《水调歌头》中写道：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，再次表现了他与世无争，躲避官场，追求闲适的情怀，但同时又表现出他的刚直不阿的性格和豪放气度。

在遭受残酷打击之后，苏轼的思想由忧愤感伤逐步走向了旷达、超脱。他此时的《定风波》词便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这里，积极的一面是刚直不屈，不避坎坷；消极的一面是任其自然，不求进取。在《临江仙》中，更表现了他醒而复醉，醉而复醒的心态。彻夜以酒为伴，但心情难以抑制，他临江倚杖而立，聆听黎明前黑暗中传来的滚滚涛声，却给他以启迪和慰藉。可见这时的苏轼，对政治前途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，强烈的政治抱负也随之而彻底淡化了。他在 1082 年写了一首《念奴娇·中秋》，词中写道：“玉宇琼楼，飞鸾来去。”这种心情和选择，与他 1076 年写的《水调歌头》词中的矛盾思想截然不同。作者想“幡然归去”，正是



此时悲观失望情绪的寄托。同样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历来被人们称之为豪放之作，其实，从思想内容上看，这首词与其说是豪放，还不如说是旷达、虚无更为准确。从苏轼思想的变化来看，这首词的核心主题是“人间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”的消沉思想。而开头的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是产生这种旷达、虚无思想的客观触发因素。因而把这首词的主题归之为表现对祖国江山的热爱，对功业的慨叹，表现词人的豪情，就显得有些牵强了。因为这时的苏轼，多次感叹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。”（《西江月》）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”“小舟从此去，江海寄余生。”（《临江仙》）这正是苏轼与世无争，物我皆忘而放情山水的自我解脱思想的真实体现。

在苏轼的晚年，他的旷达、超脱思想更加强烈。1093年，哲宗亲政，旧党又受打击，苏轼一月之内三次降职，安置到惠州，转迁琼州，远离朝廷，身处江湖，他表现出不随波逐流的清静境界，超然处之。可以说才算真正解脱了。于是，他在边疆的生活中，与人民相处得很好，作词表达自己的心境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

长作岭南人。”“九死蛮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诗作表达了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明达、开朗的情绪，这一段生活是苏轼平生一个美好而感人的尾声。

从以上对苏轼思想的论述，可见苏轼有时是以儒家思想从政，有时是以佛、道处事。随时机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，用来应付人间的艰难挫折，甚至修身养德。顺达时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，积极进取，以尽人臣之职；而在不幸之时，则佛老思想上升，用来解释人生进退的困顿。特别是他半生走过了坎坷艰辛的人生道路，但苏轼并没有陷入悲观绝望之中，而是随着多次谪贬，游历祖国各地，欣赏四方名山大川，在自然界中得到安慰。在地方官任上，他体察民情，政绩卓著，得到了人民的肯定和赞扬。他病死常州，“吴越之民，相与哭于市”就是明证。总之，苏轼是以其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走上了仕途，而在仕途的坎坷经历中又忧虑、矛盾，最后食尽人间“愁滋味”，而归宿于佛老的旷达超脱思想。

贺铸及其词

宋词管窥

关于贺铸的词，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北宋多家，以方回最次。”对贺铸这个批评似乎过于偏激，也有些不公平。笔者认为，贺铸是苏轼之后较有创新的词人。贺铸的词抒怀、述志、咏史、咏物、悼亡、艳情都有，而且词的内容比较丰富，风格亦比较多样，研究北宋词人不能不论及贺铸。

贺铸，字方回，自号庆湖遗老，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他出身寒微，早年以武举入仕，曾任州县小吏。他为人刚直，不畏权贵，曾因上书言事被贬。他的词多写个人生活，抒发怀才不遇之感，也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。他的词风多样，既有豪放的一面，也有婉约的一面。他的词在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，对后世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贺铸（1052—1125）北宋词人，字方回，卫州（今河南汲县）人。宋太祖孝惠贺皇后族孙，所娶亦宗室之女。自称远祖本居山阴，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后裔。贺铸年少读书，博学强记。任侠喜武，喜谈当时事，“可否不少假借，虽贵要权倾一时，小不中意，极口诋之无遗辞”（《宋史·贺铸传》）。十七岁时离家赴汴京，曾任右班殿值。监军器库门，出监临城县酒税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改官濠阳都作院。元丰五年赴徐州领宝丰监钱官。由于所任皆冷职闲差，抑郁不得志，自称“四年冷笑老东徐”。1088年赴和州任管界巡检。属武官，但位低事烦，不遂其愿。不久因苏轼等人推荐，改文职，任承侍郎，为常侍。绍圣二年（1095年）授江下宝泉监，在任上整理旧稿，编成《庆湖遗老前集》。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因母丧去职，东归，游历苏、杭一带。服丧期满宋徽宗召为太府寺主簿，继改任宣议郎，通判泗州。（崇宁四年1105年）迁宣德郎，通判太平州。大观三年